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丛书

主编 林在勇

王钟翰 著 诸同学 整理

王钟翰学述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RENMIN CHUBANSHE

丛书策划:周游工作室
责任编辑:周向潮
封面设计:信天翁工作室
责任校对:李育智

王钟翰学述

王钟翰著 诸同学整理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照 排	杭州天天电脑信息处理有限公司 (杭州武林路 125 号)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 (杭州环城北路 41 号)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7.5 万
插 页	2
印 数	1 - 5000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1680-6/G · 454
定 价	1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MULU

王钟翰 学述

叙 言	1
少年时代	5
燕园问学	20
一代学风	44
沦陷时期	59
光复解放	79
我的几个专攻方向	86
关于清史研究	86
关于满族史研究	140
关于满族社会经济形态	170
关于清代各民族与宗教政策	201
关于清代史籍的标点和校勘	226
附 录	261
著述目录	263
研究评介资料	276

叙 言

“学述”只是表述一个学人的家世、治学、求师、学术钻研、别辟蹊径、成一家言与师承渊源之全部记录，与自传有别，凡与为学无关之事，均可不入录。

我这本不像样子的《学述》，不下十七八万言，重读一遍，掩卷以思：钝鲁如翰，一生有幸得忝列好几位饮誉海内外的国学大师之门，朝夕相待，耳濡目染，数十年间，虽顽石亦应被感化成立；乃我每有一小起步，即中断不前，迄无一技之长。回忆大学时代，正是精力充沛、写作旺盛之际，遍阅清四通、清五会典，访罗有清一代各部署则例，开始步入典章制度之门，竟以大学被日军占领而告吹。自后，远涉重洋，以多学语文为职志而忽略其他，亦以半途辍学买棹言旋。真所谓学书学剑不成，浅尝辄止，终于不克有成，缅怀先师，敢不惭恧？马齿加长，弥增仰止！

建国初，方投入清史研究领域，即转入满族史研究领域。二者本为一体，内部联系极为密切，但究竟断代史与民族史各有不同之处，融会贯通，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尤非一朝一夕之功。我素嗜考据，因接受思想改造，服从国家需要，不能不受新时代之潜移默化，繁琐考据少了，理论性话

语多了,应该说是我的一点进步。可是有友人说我在 40 年代末至 50 年代初对雍正夺嫡一案发表了两篇比较像样的文章以后,三四十年来似乎自甘寂寞,不再继续有所新作了。其实不然,从 1957 年被错划右派直到 1978 年彻底平反以前 20 年间,我固然是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但就在平反的那一年(1978 年),我也曾发表了表面与夺嫡无关的《雍正西南改土归流始末》一文;80 年代中,拙作《清圣祖遗诏考辨》一文,就是明显地继雍正夺嫡研究之后而写的较有分量的一篇长文。继而在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我连续又发表了《胤禛与抚远大将军奏档》和《年羹尧西征问题》以及《释阿其那与塞思黑》和《再释阿其那与塞思黑》四文,目前我手头上还有《康熙敕谕抚远大将军王胤禛档》和《三释阿其那与塞思黑》两文待发表。上述几篇,长的达五六万字,一般在一万五千字左右,最短的一篇也有六七千字。我钻研探讨的结果还是坚持四五十年以前雍正继位系由篡夺而来的看法,可喜的是订补了我以前的一些小的失误和不足,可以说平日读书还算比较细心的。同时说明,我并不认为自己对雍正夺嫡的认识已经达到铁证如山,再没有可以讨论的余地了;恰恰相反,只要一旦有新材料新见解,我还是愿意继续讨论下去的。人们常说,问题讨论不厌其详,如果结论经不起时间的检验,翻案不但是可能而且也是完全允许的。

其他如满族史、满族社会经济形态、清代各民族与宗教政策、清代史籍的标点与校注等几个专攻方向的进展情况也大致如是。本书对这五个专攻方向的叙述上,在所难

免地会出现这样或那样重复交错的情节和语句，但每一专攻方向十分清晰明确，重点也非常突出，是不会引起误会的。

这里必须提出的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丛书主编林在勇同志去年春来函以《学案》名义约稿，我个人认为眼下健在的人不应自写《学案》，婉言谢绝了。去秋林同志因事北来，枉驾见访，重申《学案》已改为《学述》，相约由我自己口述，可请一位或多位同学执笔。林同志返沪后又通信联系，并签订出版合同。从去年10月开始，由我口述，姚君念慈执笔，陆续写成：少年时代、燕园问学、当代学风、沦陷期间、光复解放共五章，大约有六七万字。而《学述》重点在第六章“我的几个专攻方向”，因时间紧迫，交稿临近，一人殊难完成，于是决定：姚念慈君继续写第一节“关于清史研究”外，又增邀定宜庄君写第二节“关于满族史研究”，刘小萌君写第三节“关于满族社会经济形态”，达力扎布君写第四节“关于清代各民族与宗教政策”，杨海英君写第五节“关于清代史籍的标点与校勘”，各位同学莫不乐于相助，并按期交稿。各节均由我的旧作有关各篇专题整理改写而成，最后仍由我审阅定稿，第一节有三万多字，其余四节亦均在两万字左右。末附著述目录和研究评介资料，则均由赵令志君整理补充编制而成。

这本《学述》由我口述与各位同学根据我的旧作综合整理改写而成，自无高攀一代大师的前辈之念，亦无与卓尔成家的同辈相比美之意；然六千年来，从事学术研究无间寒暑，其中酸甜苦辣、甘苦得失，岂无自知之明？敢以公

诸于世者，我的失败教训和不成熟经验或有裨于青年学者与来哲以可资借鉴耶？我之堪足引为踌躇满怀者，长达十七八万言之《学述》竟能于短期内完成，此则诚得力于多位同学之欣然竭力相助也。

一九九八年元月王钟翰 撰于中央民族大学私寓
同年八九月因通校全稿清样又重加审订钟翰再识

少年时代

1913年我出生于湖南省东安县。前一年，正好是国民政府成立。按我们王家的谱序，我属于“忠”字辈，家里给我取名“忠汉”，自然是受到当时“驱逐鞑虏（满族），光复中华（汉族）”的影响。没有料到，我后来大半辈子学术研究，却与清史、满族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东安位于湖南西南边界，地处五岭山脉北麓，越过岭脊，就是广西省全州（今全县）。东安地理偏僻，境内山峦起伏，湘江上游潇水由西向东蜿蜒流过全境。历史上东安县曾属永州府，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斥到永州做刺史，有名的“永州八记”就写作于此。湖南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曾是政治风云激荡的舞台，东安又是岭南进入中原的必经之路。当年太平军在全州起义封王之后，就是由东安进入湖南境内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出师北伐时，我当时还小，站在家门口还隐隐约约地看见过相去二里以外对面山坡上，张发奎率领的北伐军荷枪而过，但在我童年心灵中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对我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另一件事。

我的家乡伍家桥所在地叫北应乡，南去约十里叫南应

乡，南应乡有一较大市镇叫芦洪市。伍家桥不过是一座百十户人家的小市镇，距芦洪市仅十里，而距东安县城约有100里。一条小河——应水与源出九嶷山的潇水流经这里，北流向东于冷水滩并入湘江。伍家桥镇便坐落在应水两岸，南北应乡由此而得名。大约在我十三四岁那年，应水之滨建起了一所类似书院式的私塾，取名应滨学社。它的创始人就是东安望族席宝田（字研芗，《清史稿》有传，因捕获洪秀全之子有功于清，赐黄马褂，卒赠太子少保）的最幼亲弟席业号梦禅。席氏发家后，伍家桥镇的高楼大厦，峻宇雕墙，莫非席氏之家。大凡席少保子侄辈的住宅坐落应水之东，而梦禅一家私寓陈旧矮小，位于应水之西，俗称老屋席家，距我家二三里之遥。席少保晚年为其后人购书十数万册，捆载舟运而归，藏之于老屋席家，是百十年来东安县藏书最多的诗书簪缨之家。

伍家桥在席少保发家以前，原本没有什么文化传统可言，也没有出过显赫功名之臣，大多人家从事农耕，安居乐业。现在我还记忆犹新，小时候我翻阅过我家收藏的《王氏族谱》，上面记载着王氏始祖名叫千一郎（名实佚），带着妻子，挑一担子，一头是一小儿，另一头是衣服家具，说是300年前从广西全州翻过南岭而来的。年代久了，王姓人口繁衍，成为伍家桥小镇一大姓，其他席、夏、唐、廖、易诸姓，远不能与王姓相比。

我的曾祖王国安和祖父王家书虽都念过书，还捐过拔贡之类的功名，但到底没有走上科举进身之途。我家伯叔与我父三人，大伯显锡（号常轩），中过武举，有气力，后来

到省城长沙席少保之子沅三的公馆闲住一些年，被沅三看中，当上了席家公馆的管家护院。我的叔父显钊（号巽安），学中医。我父亲显镰（号子秉），只好弃读就耕，负起全家的家务，除雇佣长工和牧童各一人外，自己亦亲自下地从事农耕。从祖父那里继承下来的产业，除乡下几十亩水旱田之外，还有便是伍家桥镇上的一家中药药材店铺，算是一个封建地主家庭。

我上有四个哥哥和四个姐姐，在兄弟姊妹九人中最小，大家都叫我“满老九”。因我一出生，就患一场大病，几至不能成活，特别受到母亲（姓唐名桂香）钟爱，从小由母亲带在身边，形影不离，因此从小娇生惯养，淘气调皮无以复加。而我母亲百依百顺，更加助长了我的娇气。举一个例说：一次过大年，破五随母亲回外公（时年八十）外婆家。当时乡下都用小炭火薰笼取暖，不知为了什么事不顺我的意，当着外公婆、舅爷娘、表兄姐的面，我执意要我母亲用双手举起小炭火薰笼放在她头顶上，我母亲居然依了我的话，将小炭火薰笼放上了自己的头顶才算完事。类似的事不胜枚举。这件事还是我于1932年夏从长沙雅礼中学回家探亲，由我哥我姐、表哥表姐们回忆起来告诉我的，并再三叮咛嘱咐，说小时我母亲对我太好了，希望我长大成人，好好报答母亲养育之恩才是。遗憾的是，我原本计划于1965年6月回家最后看望我母亲她老人家一次，谁知我尚未成行，她老已于这年5月逝世了，享年九十有五，而我不孝，竟未得临终一面，只有抱恨终天了。

因我得到母亲过分宠爱，从四五岁记事时起，便终日

嬉戏。偶尔母亲叫我上街买菜,开始给钱买一两样,继而三四样、五六样,最后多到十几样,我都一一铭记于心,照买无误,颇受夸奖。但每年春冬之间,我每天一早即携带一个饭团,跟着长我六七岁的放牛娃离家外出。我家附近方圆十里之内,不管深林密箐、险峰峻岭,均是我随意遨游之地;沐浴于烈日寒雨,至少承受了大自然五六年的磨练。这使我从小练就了一个能吃苦耐劳的好身子,以至 70 岁以前从未进过医院看病。

从 9 岁起,我跟我大哥忠瀛(号陆仙)常住在镇上店铺里。至今我还记得店中供着药王孙思邈的神像,每逢旧历四月底药王生日还要祭奠。我很晚才识字,是我大哥教的。大哥教得很认真,对我期望甚高,我记得他对我说过一些“君子务其大者远者,小人务其小者近者”之类的话。大概是指望我将来能立功成名,光耀祖宗。10 岁,我考入小学,但念了不到两年就辍学了,因为我的小哥忠渠和堂哥忠浦到芦洪市或零陵县(原莲溪书院改的中学)等地读小学、中学,书未念好,讲究吃穿,花钱太多,当时家中颇感拮据。我父亲认为新式学堂不好,让我就近从开蒙师族曾祖国才读书。一开始即授以《论语》,什么“学而时习之”,咿唔学语,不知所云,但也认识了一些之乎者也。之后才入本乡北应乡的初级小学。

两年卒业,乃转入席少保孙辈席沅三家的私塾,春天开学,同学 4 人:席家世钺、代琛、代璠与我,老师唐子玉。开学日,学生先叩拜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双膝跪地九叩首,再拜唐老师,三叩首。私塾设于席家西花厅内,据说席少保晚

年家居时即常来此休息。老师一间住房，同学2人共一间住房，客厅一间，每日讲书用膳均在其中。唐师管教甚严，平日不许出西花厅一步，只星期六下午才许回家住一宿，星期日必须回来。头一年，学习《诗经》，从首至尾，逐句逐章讲解，每日讲一二至三四章，第二日开讲新课之前必须默写已讲之课文，年终抽查某章某字，必须念出全章全句来，才算合格。又每晚就寝前要写日记一二百字，至少数十字交上，第二日批改发还。

第二年春节过后，我们同学4人仍回到席家西花厅从唐子玉师就读，开始学习《春秋左氏传》，讲解和学习方法一同于前，只增加课文字数，每日至少200字。唐师讲书比一般私塾有所改进，但因习相仍，不大合乎我们要求。一次，席世钺因逃学而被处罚跪于孔子神位前1小时，引起大家的不满。每当唐师躺卧在客厅藤椅上吸烟时，我们便齐声朗诵“子玉无礼哉”，“子玉可杀也”（皆《春秋左氏传》中语），一泄平日胸中之愤。唐师听了，明知矛头所指，也无可奈何。现在想起来，小时候多练点背功还是有好处的。就在这一年，家乡闹土匪，大户人家四处躲避，唐师回家未能及时返回，席家散馆。我遂转入离我家更近的夏氏宗祠私塾，主讲老师为我乡拔贡夏凤喈。夏老师教法又不一样，他主讲《易经》，这是因为来学者30多人，年龄均多在30以上。当时我年龄最小，听不懂他讲些什么，只见他摇头晃脑，津津乐道。对我唯一的新鲜事儿是作文，每逢五之日（即每月3次）必须作文一篇，不论长短，他都亲自批改，发还时他还要指点一番。今天回想起来，作文方面多少受了一点启

发。上面所提到对我产生一定影响的几家私塾的学习时间，总共大约两年。如果没有应滨学社，我能接受的教育，差不多也就该仅此而已了。

应滨学社并不算一所新式学堂，但我却因应滨学社而转入后来的新的学习生活。湖南自明末清初王夫之在衡阳开创船山书院，200多年来学风极盛，书院几遍及全省各地，学者辈出，为全国之翘首。加之清末王闿运、王先谦辈均是经史大师，三人治学门径虽不尽相同，而当时学人尊称之为湘南三王之学。同时，谭嗣同、梁启超辈讲学长沙，又为全国变法维新开风气之先。可是东安由于地处偏远，似乎被抛弃在时代潮流之外，只有应滨学社的出现，可以说是近代风云的一点余波。学社创办人席梦禅的本家席少保，因早年投身曾国藩的湘军，转战多年，镇压太平天国有功，博得清廷的封赏，席家由是便成为东安县巨族。清末民初，社会上有一种风气，许多社会上层人物在猎取功名之后，并不希望自己的子孙继续混迹仕途，而是资助他们读书求学，以另辟蹊径，希冀成为书香门第之族，维持家族声望不坠。席少保归田后提倡族人子弟读书，显然也是受到这种风气的濡染。1927年，席梦禅在应水之滨，离伍家桥五六里地方兴建新居，应滨学社即设在其中（席少保藏书后全归席梦禅所有）。在收纳40多名学生中，席家的后人占一半，其余一半为外姓。外姓子弟需交纳学费，以半年计，每人10元，这在当时就算不低的了。应滨学社的教育可以说是半新半旧的。学习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开始就是讲《礼记·檀弓》，然后是《曲礼》、《学记》。每周3次，由梦禅师亲

自讲授。讲授的方式则是新式的,讲究分析主题,语言也不全为文言,是半文半白,学生都能听懂。梦禅师讲课很带感情,讲至“祭神如神在”祭祀之礼时,大约是想到其父母俱逝,常常声泪俱下。此外还有古文课,教材是曾国藩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挑选其中的名篇作为范文。如《太史公自序》、《说文解字序》、《前出师表》、《陈情表》、《桃花源记》、《归去来辞》等等。作文讲究方法技巧,强调气势通贯、文字简练。课余也允许我们读《聊斋志异》之类的闲书,有时他还为我们讲解一两段。对于应滨学社的学习,学子们都很喜爱,我也非常投入,年终考核,我名列第四。梦禅师的七子启骞学得最好,但不便给第一,只给了第二名,将第一名授予了一位 40 多岁的姓唐名恕字心如的老童生。

在这期间,梦禅师的五子鲁思(名启骅)回到故乡。鲁思早年在外游学,接受新思想新文化,国学功底也很深厚,在北京曾结识陈援庵(垣)、余季豫(嘉锡)诸先生,后来回湖南,先在衡山书院讲学,稍后到长沙明德中学教国文,当时约 30 岁。1927 年大革命,北伐军经过湖南,形势动荡,席鲁思于是回乡暂避。家居期间,席鲁思也在应滨学社代讲《说文解字》,他用的课本是王筠(篆友)编的《文字蒙求》,浅近易懂,但他思想上并不赞成这种教育。1928 年底,长沙雅礼中学复校,聘请席鲁思回长沙任教。他想带几名学习好的学生去长沙接受新式教育,也选中了我,大概是因为我年纪轻吧。征求我父亲的意见,我父亲考虑到席先生是有学问又见过大世面的人,跟着他学对我的前途有好处,便欣然同意。正好就在这一年,我父亲为席沅三之子式乾

(席宝田之孙)清理东安本县的田产,约有1000多亩,弄清了这一大批田产的位置所在和具体田亩数字,甚得席式乾看重。他听说我父亲同意我去长沙求学,马上向我父亲表示在长沙多给我照顾。他的长沙公馆在南正街织机巷13号。我还在应滨学社读书的时候,正是席式乾主动把我的原名“忠汉”改作“钟翰”,改得不俗,一直沿用到今。当年12月,我便同席家三兄弟启骞、启鹭、启骥3人一起,离开了家乡故土。我家虽比不上席家富庶,既一同远行,席家三兄弟都各乘一轿,我父也为我雇了一轿。从家到宝庆(今邵阳市)共240里,我因身子好,喜欢走路,便让轿夫抬着空轿走,大概我前后坐了不过40里左右。从宝庆改搭公共汽车直达长沙。从此踏上了新的生活之路,这一年我15岁。

长沙雅礼中学位于城北蔴园岭,隔一条马路,对面就是湘雅医学院和湘雅医院(今均改为湖南医学院和湖南医院)。雅礼中学本为雅礼大学带预科班,是美国人办的新式学堂,北伐战争期间停办了,1928年秋复校只恢复了预科班,于是改名雅礼中学。学校规模不很大,学生不到300人。教学楼为一长排平房,学生宿舍是两栋三层楼房,盖得都很讲究,是标准的洋楼了。此外,操场、礼堂等也一应俱全。席先生来后任高中三班国文教员。我们入学须分科考试。我们一行4人中,只有席启骞考上了正式班初中一年二级,我因未学过数学、英文,只得与启鹭、启骥两兄弟同入补习班。补习班的学生大约有30人,都是原初中一年一级的学生,他们因一门或两门功课未及格而留到补习班的。因此,这个补习班比较特别,比一年二级差一些,又比一年

一级高一些。当时学校做出规定：凡补习班学生念得好的，期中考试成绩达到标准，可以直接升入初二，余均仍回初一。我开始发奋学习，仅一学期，便幸运通过考试，直接到初二，与启骞同班（启骞只念了半年，便转入明德中学去了）。这对我是个不小的鼓励，觉得新式科目也并不可怕，信心更足了。席式乾从其堂叔席鲁思那里知道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那年暑假就把我接到他长沙南正街织机巷公馆去，住在西客厅一间书房里，平日还教我一些书法和古文。有时客人造访，也给我介绍认识认识，意在扩大我的交游。特别要提出的，是席式乾带我去徐家拜见他最尊敬的徐六先生（名桢立号绍周），向徐六先生请教书法。徐六先生博学多艺，诗词歌赋，楷隶八分，样样精通，问无不答。我对他也深有望若“蓬莱文章建安骨”之想。后来席鲁思离开雅礼后，徐六先生也曾受聘来雅礼高中教过短期国文课。学校功课则不然，当时教会学校非常重视英语，雅礼每周每天上午8~9时都安排有英语课，由美国人耶鲁大学毕业生何钦思、俞道存、韦果尔、沙义尔、骆吉思、富尔敦诸人分年分别到我们班用英语讲授，一句汉语也没有，学生在课堂上也只许讲英语，这就迫使我非学好不可，我的英文就是在那时打下的一点基础。1930年夏季学期结束，全校各年级按分数排队，我竟然名列初中最高分，得了第一名，当时自然喜不自胜，由此更加努力。其实当时我班学习最好的首推程治平兄，只因一次就寝熄灯后他说话犯规扣分落了选。

当年还有一段小插曲，就是红军在李立三左倾路线指

导下攻入长沙，国民党长沙守军何健的部队撤离到城外，长沙一片混乱，人们纷纷外出躲避。当时席式乾也陪伴他母亲由长沙北上汉口，想再乘舟东下到南京避难。就在这时，趁席式乾尚未离汉口之际，席鲁思叫我护送其七妹昭若与一子一女去汉口会同式乾母子一同到南京去找谭延闿。因为当时南京行政院院长谭延闿未发迹之前，曾在席沅三公馆闲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受过席家恩惠，所以席式乾这次逃难去找他，满以为可以得到一官半职的。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席氏一家未到南京之前，谭延闿逝世了。但这次我送席氏家眷到汉口一事却引起席式乾母亲的极度重视，认为我小小年纪，胆大心细，不畏艰险，办事认真负责，于是又叫我返回长沙将她家准备过冬的貂狐袍褂装成几大箱，搭火车运到汉口，再直接水运南京，以作久住之计。我也遵嘱办到了，他们自然都很高兴。这时谭延闿虽已逝世，但在南京仍有行政院礼宾司司长席楚霖（席家孙辈，未发迹前也受过席家许多恩惠），他家也可以借住，我在南京就同住在他家里。在这段时间，式乾带我逛秦淮河，乘游艇穿梭在玄武湖荷花莲蓬之间，登鸡鸣山寺，还准备让我投考金陵中学。在南京呆了不久，听说红军退出长沙，学校也复课了，于是我一人又先返回长沙雅礼中学。这次奔波，时间虽然不长，但毕竟耗费了不少精力，影响了学习，尽管我加倍用功，但初三毕业时我已与第一名无缘，退居第二。按雅礼中学的规定，前三名的学生可以免考直升高中，我也获得了这种资格，多少是一点安慰，心里轻松了许多，可以回家向父母兄长交代了。暑假我回到了故乡，这